



令人難以忘懷的三件大事

安貝蒂著

陳愛潔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當「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時候，很少人會推測到，在五十年以後「站起來」這句話對中國和對世界具有甚麼意義。在今期《鼎》雙月刊組稿之時，我們審視了過去五十年在中國發生的大事情，並選出其中三項作進一步討論。選擇的準則是：要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不管是好是壞；其影響必須超越歷史時刻，給未來留下痕跡；不但對中國，也必須對世界具有影響。

選擇並不容易。我們所選的第一項是「文化大革命」，透過除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

俗、舊習慣，企圖破壞中國生活和文化的基礎。這包括一切宗教都被消滅。

第二項是天安門事件。隨著人們從傳媒觀看到屠殺的過程，這件大事震驚了世界。估計約有二千名曾經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仍被囚在獄中。再者，十年以後，這事件仍能驅使數以千計的人在六月四日一起停下來，紀念和祈禱。

我們的第三個選擇是香港和平回歸祖國。在人類的歷史上，這是史無前例。

當然，其他選擇仍多不勝數，而我們的讀者，也許會作出不同的選擇。但是，仍希望你們贊同我們，這三件大事的確是過去五十年來，在中國發生的其中最具有意義的事件。無疑地，它們不但在中國，也在世界各民族留下痕跡。

當黑暗籠罩著大地：文化大革命

張家樹主教生性和藹，他經常靜悄悄地嘗試取悅每個人。他曾經在法國留學，但他在中國的老家卻沒有真正的社會地位。一九六零年，天主教愛國會揀選這位謙遜的人出任上海主教。他當然不會給任何人帶來麻煩；他總是熱切地取悅別人；他總是馴順的。說來也奇怪，在文革期間，紅衛兵竟捉拿他，控告他是叛亂份子。他們把大牌子掛在他的頸上，押解他遊街示眾，對他極盡侮辱奚落。他每天要面對無休止的批判大會，最後還要受公審。張家樹主教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教會人士、專業人士，以及其他知識份子都曾經受磨鍊。

革命開始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希望重振革命精神，以及重振他本身的政治野心，於是展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他想透過這

個龐大的民衆運動，說服人民採納他的思想，而不是黨內反對者的思想。爲達到這個目標，他動員造反派攻擊他不滿意的領袖。這些造反派，或紅衛兵，成爲文化大革命的先鋒。一九六六年秋，約一千三百萬名紅衛兵雲集北京舉行集會，支持毛澤東。然後，他們分散到全國各地，著手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文化大革命爲全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粉碎共產黨青年的夢想，幾乎摧毀了中國光輝的文化，爲了毛澤東的「紅皮書」而犧牲古典文學的寶藏。它也幾乎把經已垂死的教會徹底消滅。

文化大革命與教會

文化大革命狂潮直接衝擊教會，主要是那些已經跟政府合作的教會領袖。自五十年代以來，部份教會領袖已爲了取悅政府而屢次讓步。他們希望這樣做能夠確保教會得以繼續存在。他們依靠中國共產黨才繼續存在，但現在，連黨本身也垮下來。所謂革命委員會，其實已接管黨在省、市，和地方

各級的一切職務。共產黨已癱瘓，教會不可再依賴它的保護。

張主教不是唯一被帶到街上任人批鬥的主教。所有曾經依靠政府的教會領袖，都要公開自我批判。他們被指爲封建迷信的餘孽，西方帝國主義的尾巴。他們掛著牛鬼蛇神的牌子。主教、神父、修女，甚至修生都遭受虐待，毒打和監禁。年老的神父甚至被迫跪玻璃。

狂怒的紅衛兵劫掠圖書館和私人房屋，搶奪聖經，焚燒所有宗教書籍和典籍，火勢有時甚至持續三天。他們拆毀十字架，打碎美麗的彩色玻璃窗，打破聖像，褻瀆聖物。他們封閉聖堂、寺廟，和學校，把這些地方改裝成爲倉庫、工廠、幹部宿舍，或作政府的其他用途。有些聖堂和寺廟甚至完全被拆毀。一切宗教活動停頓，各宗教的領袖被捕，然後被送往監獄、勞改營或農場。不少人變得完全的意氣消沉。主教和神父紛紛被迫結婚，甚至娶修女爲妻。其中很多婚姻只是名義上的，不過是爲了向

政府登記。當然，有些人真的結了婚，因為他們確信教會已死，永不會復興的。還有其他的人仍企圖與政府維持良好的關係，好像衡陽的郭則謙主教，和山東的宗懷謨主教。其他不少知識份子，因沮喪和不能忍受種種屈辱而自殺。

當時，有人指出，「中國再沒有宗教；宗教已被關在歷史博物館裡。」然而，很多人，甚至那些追隨政府路線的人，仍堅定地忠於教會。他們在文革結束後獲釋，並從此全心全意重建教會。

有些人從不妥協

當然，也有些人從不跟隨黨的路線。他們早於五十年代已被囚禁，文革期間，仍被困在監裡。他們反而能夠躲避文革的瘋狂。事實上，相比外面發生的事情，監獄確實是平安的避難所。許多人把他們被監禁的日子和痛苦視為寶貴的恩賜。廣州教區鄧以明總主教在他的自傳《天意莫測》裡，描述他在監裡的漫長歲月：「每天如此唸經、默想、唱聖歌，全日我都沒有空閒的時間了。這種種神功每

日都一樣。這是支持我度過二十二年監牢生涯的力量，克服精神上、物質上的種種困難，使我心情舒暢……這種靈魂深處的平安，使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在監獄平安度過二十二年艱辛的歲月。」

風雲萬變

一九七零年七月十日，中國釋放最後一位被扣押的外籍傳教士——華理柱主教。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政府重開北京的南堂，用來接待外國及外交團體。儘管當時文革仍進行得如火如荼，這兩次事件都令人滿懷希望，期望事情最終會好轉。

自一九六六年以來，紅衛兵的野蠻行為已把國家推向完全的混亂當中。一九七三年，當局要求人民解放軍恢復部份法律和社會的表面秩序，局勢才開始平息。解放軍嘗試重新穩定運輸、工業、金融和貿易。最後，他們把這些曾經造成如此巨大破壞的年輕人送返家園。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而「四人幫」迅速被補，其政治生命亦隨之結

束。華國鋒接替毛澤東，出任共產黨主席，他在一九七七年八月的第十一屆黨大會上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

一九七八年，再被打倒的鄧小平又再次上台。很多曾被冤枉，或被指控為「右派份子」的人——包括很多幹部和教會人士——都從監獄釋放出來，並獲得平反。甚至早在五十年代經已被囚的教會領袖都獲釋。教會再一次從文革的死灰中甦醒過來，並希望第二個春天來臨。

今天的紅衛兵

隨著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的日子，我們不妨一問究竟當紅衛兵的是怎樣的人，今日他們又成了甚麼樣子？

紅衛兵代表一九四九至五九年出生的二千七百萬中國人。今天，他們正是年屆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約佔中國城市人口百分之十。昔日，他們是一群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在求學時期也被差遣去上山下鄉。他們在那裡忍受極度艱辛，嘗試在山區或偏

遠的農村掙扎求存。他們認為，一切奮鬥都是值得的，因為自己幫助改變落後的農村，可以為國家作出偉大的貢獻。然而，他們在離開的時候，他們的痛苦並沒有製造甚麼分別。一切都沒有改變。他們是一群接受過洗腦的年輕人，把毛澤東奉為神明，要忠於國家，而且，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要仇恨「人民的階級敵人」。他們所學習的模範，都是願意為社會改革而犧牲的人物。他們在農村住了一段日子後重返城市，很多事物經已改變。他們只要花點兒時間，回顧一下他們漫長的惡夢，便會開始了解他們為自己和國家所造成的傷害。他們已失去了十年的光陰，而有些人現在還要繼續他們已停止的教育，實在為時已晚。即使尚算年輕的，也不願意回去求助，因為他們會無情地痛打自己的老師。他們沒有準備，或者沒有接受足夠的教育，在鄧小平倡議的自由市場改革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仍保持自己的理想，現在確信中國永不可再回復毛澤東主義。那些追求民主理想，並在那一次有助推翻

四人幫的「四五行動」中擔任先驅的，也參與民主牆。其餘的仍在精神真空狀態中徘徊，嘗試活出生命的意義，並尋找意義。他們常被稱為失落的一代。但是，人的精神具有復元的力量，而且為那些仍保持理想的人，當然沒有失去一切。

未能忘記：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二年，發生了一件震撼整個中國的大事，那就是六四天安門民主示威。一連串的示威行動最終受到當局的鎮壓，數以千計手無寸鐵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及其他平民被殺。士兵也有死傷。有人計算死亡人數高達七千人。《中國新聞分析》在分析這次慘劇時，寫道：「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全中國和全世界都為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屠殺而沮喪、悲傷、哀悼。沒有人知道那一夜究竟有多少受害者死去，也不知道翌日要火化多少具屍體。」屠殺不限於北京。在成都、上海、蘭州等地都舉行過大型示威。

然而，政府的官方報告仍堅持大約只有三百人在廣場喪生，其中只有廿三人是學生，其餘的都是軍人。國際特赦組織沒有說明死者的身份，或提供任何特別的數據，他們估計仍有接近二千名曾參與事件的人被囚在全國各地的監獄裡。中國政府一直堅持這次軍事行動是正確的，為了國家的穩定，這是必要的。

大事紀要

一九八九年

四月中旬：大學生開始上街遊行。他們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新聞自由，以及一個反貪污，反特權的政府。

四月廿三日：在胡耀邦舉殯當日下午，學生下跪向當局提出這些全新的要求，也隨著國歌的歌聲而表達。

《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把學生的行動定性為「動亂」。

五月十三日：政府沒有回應。學生決定把抗議行動

升級。

五月十五日：趙紫陽結束北韓的訪問回國，他承認學生的愛國意向，嘗試平息他們。

五月十八日：李鵬接見學生代表。他對學生的態度及他完全拒絕討論的立場令到學生大感不滿。

五月十九日：政府在北京實施戒嚴。傳媒工作者和學者首先加入學生的行列，跟著是公職人員、工人和大批民衆。

趙紫陽用揚聲器請求學生們離開廣場，讓他對黨內的問題承擔責任。

五月廿一日：中國的事件喚醒香港華人的民族感。

一百萬香港市民行動，顯示他們的團結。

五月廿八日：為聲援北京的示威者，香港舉行多次大型遊行示威，包括一百五十萬香港市民大遊行。

一個由香港演藝界舉辦的流行歌曲演唱會籌得一百二十五萬元。

香港的基督教徒在部份教堂內舉行廿四小時守夜祈禱。

四萬名天主教徒參與特別的祈禱聚會。

五月廿九日：北京的學生仿照美國自由女神像的造形，豎立「民主女神像」。此舉受到政府控制的傳媒譴責。

六月三日：軍隊在傍晚開始入城和進駐廣場。市民立刻趕來攔截他們。其中一名目擊者從酒店的陽台，透過望遠鏡看到人們被開槍射殺，被高速行駛的裝甲車和坦克車碾過。數以千計的人死亡。

六月九日：鄧小平透過電視讚揚軍方「通過效忠的考驗」。

六月中旬：直至六月中旬，已有超過一千人被捕。

一九九九年：現時估計約有二千人仍被監禁。

今天，六四的一代在那裡？

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我們指出，估計今天仍有多達二千名曾參與天安門運動的人士被囚禁。那麼，其他的人在那裡？袁子明在他的「今天六四的一代」一文中告訴我們，很多參加者能夠逃離中國。大多數人最前前往巴黎，然後轉往美國。其他人則

無奈地留在香港。一旦在美國，很多人參加海外民主運動。然而，隨著時間過去，他們轉而努力追求自己的個人目標。有人繼續深造，考取學位；有人成了客席學者和教授，有人從事研究和寫作。還有人開始自己的生意。其中很多人的家人在稍後時間都來到美國。只有很少數仍對於海外民主運動感興趣。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其中部份人士在抵達西方後，才初次接觸基督信仰。自此以後，有些人領了洗。其他沒有領洗的人則自稱為文化基督徒。「這些中國人發現，無可否認，在西方民主體制所找到的價值觀，包括自由與人權，都是與基督信仰息息相關的。」

十年以來，六四事件仍吸引五萬名市民到維多利亞公園，停下來想想中國所做的一切，並悼念那些爲了國家利益而在壯年時期被殺的人。世界將一直記得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至四日災難性的一夜，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

在鎮壓前幾星期的興奮日子裡，很多人過於樂觀。他們以爲民主會突然降臨。自從鎮壓以後，我們當中有些人變得特別悲觀，天安門在中國歷史上，總是產生問題，而不會解決問題。研究這段中國歷史的人很可能會停下來，問道：如果……：將會怎麼辦？

香港重歸巨龍懷抱

隨著我們仔細查閱中國歷史在過去五十年來的起起落落：它的成與敗，它的愚蠢、恐懼，以及驚人的成就，其中香港回歸祖國，對中國和世界來說，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

歷史的時刻已到來

在回歸日前的七年以來，每年都有六萬人移民海外。他們大多數是專業人士或商人，他們恐怕鄧小平原先爲台灣回歸而構思的「一國兩制」不會落實。一九八四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國總理趙紫陽一起簽署就香港前途問題而擬訂的中英聯

合聲明。當時，正式交接的日子似乎還很遙遠，但是，這個時刻已來到了。

鄧小平也曾對於他自己構思的「一國兩制」計劃表示有某種保留。一九八七年，他在一次演講時，就香港未來的自治定下一些規範：「中央政府不會干預特別行政區的日常事務，也認為無須這樣做。但是，如果發生了一些事……威脅危害國家的基本利益時，那怎麼辦？有人能想像香港可完全免受騷亂和破壞勢力影響嗎？」

回歸後一年

回歸後的幾個月裡，人們是快樂的。國際社會認為香港已順利回歸，「總的來說，香港以出色的成就經歷了回歸。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股票市場。」股票指數屢創高峰。另一個指標，就是公眾一致對政府的表現，尤其對行政長官的表現感到滿意。然而，還有另一個更有趣的指標，是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所提出的。李氏不斷批評政府，現在也似乎頗滿意新成立的特區政府，以及中國政府的表現，尤其

在對待香港政治反對聲音這方面。他接著說，「我希望這是建立信任的開端，但也須要一點兒時間來培養。然而，當他們看到順利過渡，他們會說，留給香港處理吧。他們越不干預香港事務，我們就越能信任他們。直至目前為止，整個氣氛都適合這份信任發展。」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清晨，當人民解放軍從邊境驅車進入香港的街道時，很多人仍感到不安。他們對於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仍記憶猶新。但是，回歸後一年，人們除了在軍營舉行開放日，娛樂公眾以外，就很難見到解放軍駐港部隊。

中國前駐港官方代表新華社的規模已縮減，並已重組。其他北京政府的駐港機構亦保持低調。

回歸後的第二年

政治局面似乎毫未受損，但是，香港更嚴重的恐慌卻來自個人完全意料之外的部份：經濟。一九九八年十月廿三日送來一個不祥的徵兆，恆生指數下跌一千二百一十一點。全世界的股票市場也搖搖欲墜。不久，解僱浪潮此起彼伏。

除了疲弱的經濟狀況外，還有其他令人憂慮的標記。很多人覺得香港政府表現得太柔弱。儘管董建華否認尋求北京的指示，仍不免令人感到他想盡辦法取悅中央政府。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九日，香港的最高法院——終審庭——解釋基本法，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擁有居港權。董建華警告，如果不採取措施阻止一百七十萬名內地子女湧入香港的話，後果便不堪設想。他更列出一張清單，包括提供額外的房屋、醫療和教育經費。很多人卻認為數字誇大。但是，香港政府表現得甚為慌張，於是決定尋求北京重新解釋基本法。

天主教香港主教胡振中樞機罕有地就政治事務發表聲明，批評香港政府在處理居港權問題的作法：「尋求全國人民大會重新解釋，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損害特別行政區自治的基礎，也動搖香港家庭的基礎。」他接著說：「此舉將引起市民懷疑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並削弱國

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

隨著第二年將近結束，經濟有復甦的跡象，但是，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仍低落，還是懷疑法治會否完整無缺，司法會否繼續維持獨立和擁有權威。

但是，我們不可低估香港人的適應力。很多居民是在五十年前以難民的身份來港的。他們抵達時，一無所有，只抱有獲得自由的意願，並願意努力工作，為能給予他們的子女一個光明的前途。現在，他們不會容易放棄自己所賺取的一切。他們的成就已贏得世界的讚賞。他們成功地把貧瘠的荒地轉變為充滿活力、令人讚嘆的大都會。無疑地，他們的後代也會延續這傳統的。

□